

北京杂文选粹

李庚辰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杂文选粹／北京杂文学会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ISBN 7-200-04546-2

I．北… II北… III．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18782号

北京杂文选粹

笑的乱弹

李庚辰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47.75印张 955000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4546-2/I·723

定价：全套100元 (共十本)

序

徐惟诚

这一组杂文集都是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的个人作品专集。

为了推进杂文事业，北京市杂文学会曾经陆续编辑过几本会员的作品集，但都是集合一定时期中众人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展示某一阶段北京杂文的水平，也是北京杂文前进脚步的记录。而且，佳作荟萃，亦颇有可观。如今，会员日增，各有不同的风格，为适应杂文爱好者欣赏、研究的需要，出版一部分会员的作品专集是有必要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出版社的支持下，这件事终于办成了一个开头。这次先出了十本，我们希望这件事还能继续办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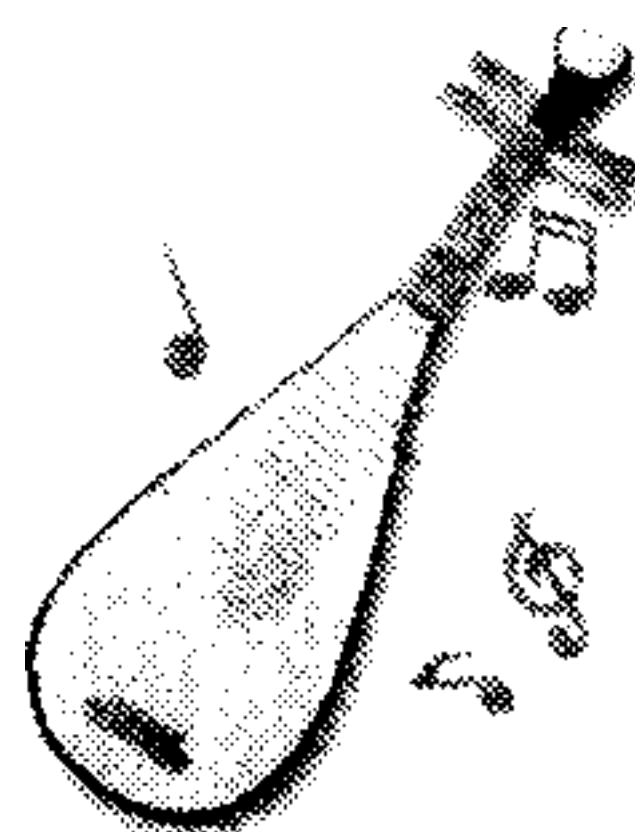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如雨后春笋。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也产生急剧变化。无数种新观念异彩纷呈。美与丑的界限变得那么模糊、不确定。包装与实质的背离使人目眩神迷。古代哲人曾经有过“多歧路”的哀叹，今日人生的各种机遇、挑战与陷阱更在过去年代的若干数量级以上。在这样的年代，是更加需要杂文的，更加需要那种简短、明快、一针见血的解剖刀，更加需要能无情地撕破各种精巧的伪装来揭示一些人和事屁股底下的旧纹章，更加需要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一句话，更加需要杂文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利益，认识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当然，也需要杂文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艺术享受。这就向杂文和杂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杂文能与时代同步，更加繁荣，希望有更多受到读者欢迎的杂文作者涌现。当然也希望北京市杂文学会的会员作品专集能继续出版，出得更精彩。

2002年2月

笑的乱弹

“观棋”一语	1
从陈香梅的批评说起	3
死人的墓葬与活人的灵魂	5
天下有道则庶人公开议	7
“直言失官”几例	9
紧急建议：成立“盖章公司”	11
“打虎”与“吓唬”	14
读报存疑	17
闲话“骗皇帝”	20
“请示学”发凡	22
“仙妻”之“仙”	25
鼠年说鼠	27
说梦	29
佩尔蒂尼的忠告	31
将进酒，杯宜停	33
假话的实效	37
笑的乱弹	40
狗的故事	43
洛加尼斯的哭	46
陈世美交了好运	48
也说“君子要与小人斗”	50

目 录



“让你出洋相”	52
流氓三术	55
曹操奈何？！	58
“影射”何罪？	61
武侯祠·医圣祠·张衡墓	64
何谓“德”？	66
“皆限男性”？	69
打错了比方	71
“真话”与“真理”	74
杂感点滴	77
“贪官短命”说质疑	80
“不想当官”何罪？	83
“恨富笑贫”病	85
难说的“架子”	88
“把不是脸的地方去掉”	91
“数战数胜”之后	93
学会“打折扣”	96
说“度”	99
谢军的脑子	101
“奇装异服”辨	103
“真没意思”	105
姑娘难当	107
王安石的度量	109

武则天这个人……	111
史思明写诗	114
宋维这号人	117
田丰的悲剧	120
孙权与张昭	122
汲黯与公孙弘	124
小红何以走红？	126
曹操与士	128
慈禧太后遇知音	130
冯道无道	133
虚词招谤	135
答古月问	137
说“记性”	140

“观棋”一语

下棋这玩意儿虽是“玩意儿”，但在“玩”的时候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作风。比如，有的人像黑李逵，大刀阔斧，一路杀去；有的人工于心计，动无不谋；有的总是举棋不定，难投一子；有的始而莽撞，继而悔棋，总敲自己后脑勺。我看到过一位不大不小的干部，棋艺平平，却赢得输不得，赢了眉飞色舞，吹牛放炮，输了就嚷嚷“不算”、“重来”；别人遵命无违，他乐得嘻嘻笑笑；万一较真不随意，他会气得一脚踢翻棋盘，使车马炮满天飞。史传清官太监连琪下得一手好棋，常陪慈禧“老佛爷”玩玩。一次，“奴才”不慎“吃老佛爷一只马”，虽然满脸陪笑，然而，事不谐矣，但见西太后勃然大怒，大叫一声“我杀你一大家”。天可怜见，傻了眼的小太监顷刻间满门抄斩，实在冤乎枉战！

不过，在位极人臣的皇老子中，有一位朱元璋玩棋时却留下一段佳话。那是他与大将徐达在莫愁湖畔对弈，徐将军惟以胜取，管他皇帝不皇帝，小卒过河，将军跳马，喊哩喀嚓，便拿下一局。朱皇帝吃了败仗，不惟不怒，还给对方以嘉奖，随即将莫愁湖指赠徐达。南京莫愁湖畔有座“胜棋楼”，即志此事，有诗赞曰：

金戈铁马建奇功，相对围棋揖让风。
敢向帝王争一着，将军毕竟是英雄。

将军“英雄”倒也是，“英雄”在不看人投子。如果知其对手为“吾皇万岁”，便甘拜下风，处处揖让，只颐哄着老头儿高兴，安全则安全矣，“胜棋楼”却没有了。然而，成此佳话者朱元璋也功不可没，倘他没有“不耻下败”的棋风气度，而像慈禧太后那样，哪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便“杀你一大家”，谁还会来“争一着”？又哪里会谄得出这么一首赞诗来？

可见，为“上”者能不能够、乐不乐意让下面“争一着”、甚至“赢一着”关系极大。能于此、乐于此，则下边必定人才竞进，各显其能；革故鼎新，建功立业亦必不犯难；反之，必弄成武大郎开店乃至慈禧弈棋的局面，则手下人装熊自保、因循缩足，成为死水一潭便难避免。自然，弄到这地步，为“上”者自己也便免不了被“将军”了。

“观棋”而思“棋”，深感为人不可不慎，为“官”尤不可不慎！

1984年11月1日

从陈香梅的批评说起

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对“北京友谊商店不友谊”的批评登报后，该店“立即召开各级会议，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决心接受教训……改善服务工作”，并且具体制定了四项落实措施，很有点知过必改、雷厉风行的味道。这当然是应当欢迎的。

不过，欢迎而外，人们也有一点感慨。我想：陈香梅是国际知名人士，居高声自远，因而批评一出，“各级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反过来说，假如提意见的不是陈香梅，而是王香梅、李香梅，恐怕就未必能收到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了。

这样说大概并非“无中生有”。谁都感觉到了，北京市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老大难”。不要说平头百姓的批评，单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批评，几乎每年都有，有关“各级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了吗？陈香梅女士这次感受到“友谊商店不友谊”，国内顾客在非“友谊商店”的商店里所受的气恐怕不止是“不友谊”了！前几年，报载北京市有位营业员，竟把一位老顾客活活气死在柜台前，成为今古奇观，事后却并未见什么“非常重视”，也未见“严肃处理”之类。难道国内顾客没有能提出像陈香梅女士提出的“非常中肯的批评”吗？当然不是。过去提出的“中肯的批评”应当说是数不完的，只不过老百姓人微言轻，说话不管事，因而人都给气死了，仍不足以引起“各级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可以说，正是因为过去不大“重视”来自群众的批评，才有了今天的受到“非常重视”的陈香梅女士的批评，

这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悲剧，虽然带有苦涩味儿。

在我们这个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家里，人民群众的声音显得太微弱了。我想，什么时候普通群众的声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能够变得像陈香梅女士的声音一样宏亮和振聋发聩，什么时候我们的“各级领导人”都能像倾听陈香梅女士的批评那样“非常重视”来自普通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呼声，那么，我们的事情一定会办得好得多。朋友和谗言虽然胜过金玉，但只靠外籍朋友的批评来“改进工作”，终究不是根本办法。要在平时认真地把眼睛和耳朵深入到群众中，也多听一听国内“陈香梅”的批评，这恐怕也是陈香梅女士所乐见的“实际行动”吧！

1986年8月

死人的墓葬与活人的灵魂

听说战斗英雄杨子荣墓最近竟被拆除，原因之一，是所在地黑龙江某市的有关部门认为杨子荣生前只不过是个侦察排长。原墓（长约3米，宽约2米，高约1.9米）超过了他这一级干部应有的规格标准，享受了不应享受的殊荣。于是，好好的一座烈士墓顷刻间按排级干部标准改建成了不显眼的普通坟墓；连原来高约2.3米、宽40厘米的一座墓碑也降格换成了高40厘米、宽50厘米的碑桩。

哀哉，级别！你使多少聪明的糊涂人和糊涂的聪明人假汝之名干出了违情悖理的蠢事！

社会既有分工，职务就有高低，有“级”就有“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是有的人对于级别的重视以及对级别的奇力神功的竭力维护以至随意扩大，达到如此程度，以至对死去几十年的人也划出了三六九等。杨子荣烈士乃闻名全国、万人敬仰的战斗英雄，也要重新按级别划等。这种做法，实在是对革命先烈的亵渎，它反映了决策人灵魂深处可悲的精神病态。

等级森严，惟等级论，决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共产党人的愿望。“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连死人也要按级墓葬，这些荒唐的规定，恰恰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革掉这种荒唐的封建等级观。虽然这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也总不能把脓液当

酸奶，常饮不厌，乐此不疲，或把已经逐步抛弃的破烂，又一个一个拣回篮子里，当作安身立命的通灵宝玉吧！杨子荣长已矣，是不可能表示气愤和抗议了，尽管他受到了不应有的屈辱。但生者应明白：对死者的礼遇，只不过是给活人的昭示。延安时代党中央机关给警卫战士张思德同志开追悼会时，是没有任何等级要求的。想不到事隔40多年后的今天，某些人却把这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显然，这种做法，是公然违背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意愿和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的。

1987年8月15日

天下有道则庶人公开议

孔老夫子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有人说，夫子差矣！实则天下无道，庶人才不议，不是不议，是不敢议，不能议，议了要吃苦头；待天下有了道了，庶人方能高高兴兴议起来——因为只有到了这时，才不怕抓辫子、打棍子、装袋子，才敢有话宣之口，有言形诸笔，形成议论纷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应当说，这些话都有一定道理，而细究起来又未必全合理。

窃以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清明的话，那么实际上，无论是“天下有道”，还是“天下无道”，庶人（老百姓）都是免不了要“议”的。区别只在于是公开议，还是私下议；是理直气壮议，还是诚惶诚恐议。“四人帮”猖獗之时，天下“道”之何存？然而，庶人“不议”了吗？还不依然到处在议！只不过淫威之下人们的思想情绪只能曲折表露，往往采用赋诗作歌、谐音隐语等形式，将所爱所憎议诸同道罢了。套用夫子的话说，那叫天下无道，庶人不敢公开议，只在私下议。真正能够公开议的，还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日益发展的今天。你看，这次人大会议，代表们指点江山，踊跃议政，对政府工作和人事安排等诸多问题，有公开批评的，有诚恳建议的，有当众发表意见投反对票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民主空气。不仅在会内，会外的广大干部、群众也议论纷纷，大大提高了参政意识。不少人还投书报刊，寄语电台，畅谈意见和要求，竞献建国之大计，形成了会内会外群策群力共议国是的动人情景；加以新闻媒介及时沟通，传

播大会内外信息，使举国议政空气更形浓烈，我国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亦复空前提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庶人是否能“公开议”，既是对“天下”是否“有道”的最具说服力的检验，也是国家兴旺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大凡国民“万马齐喑”之时，这个国通常就很不美妙了。夏桀、商纣谬杀谏谏之士，结果招致国破身亡；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仅未能如愿止谤，反招天怒人怨，被国人流放晋地；隋炀帝“不喜人谏”，谁“议”杀谁，逼得人则敬以兵戎，使他的“好头颅”迷迷糊糊在作威作福时被不准说话的臣民“斫”了去……“四人帮”搞“全国专政”，“不准乱说乱动”，结果呢，也并未箝住众口，十亿人民于无声处听惊雷，不惟1976年4月5日演出了天安门广场威武雄壮的抗议活剧，更把这四只横行螃蟹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此正是：“江流关不住”，“防川终必溃”。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无拘无束地公开议论纷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四人帮”这伙法西斯恶魔不让人们说话的结果。而大凡国民能够“畅所欲言”时，也正是政通人和国运兴隆之日。此情此状，例莫多焉，不言自喻。

所以我说，庶人公开议好得很，是社会主义民主日益发展的新气象，是国家改革开放兴旺发达的新标志，是人民群众心情舒畅、增强了国家主人翁意识和参政意识的新情势，是举国团结奋斗夺取现代化建设更大胜利的新局面。日本共同社记者伊藤信说：“中国朝民主化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诚哉斯言！

1988年4月14日

“直言失官”几例

说话直出直入，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这本来是好事。然而，往往行不通。自古以来有为直言倒楣的，有为直言吃苦的，有为直言丢命的，也有为直言失官的——乌纱帽戴得正起劲，只因说了几句直言真话，便被一巴掌打下去，又当起了平头百姓。

这种事不少，随便举几例。

号称“关西孔子”的“四知杨震”，官风廉洁，办事也认真公道。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安帝的乳母王圣和她的女儿伯荣凭着与安帝的关系胡作非为，杨震上书安帝，要求将王圣母女赶出宫去，“莫使往来”。话说得直切激烈，不想不仅未解决问题，还得罪了王圣母女及其同伙，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过不久，杨震就被撤职“遣回故里”。

杨震之后的韩愈也是直言失官的主儿。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朝野上下都发了疯似的准备“迎佛骨”，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给泼了一瓢冷水，上书皇帝，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不料直言不如唱颂歌惹人喜爱，于是也立即被摘掉了乌纱帽，还差点丢了小命。

同生唐代的杜甫也吃过直言的苦头。房琯案发时，他直言切谏，为房琯说话，这就惹恼了唐肃宗，一翻脸把他打成私党，从左拾遗顷刻贬成了华州司功。元稹作《杜君墓系铭》，称他“直言失官”，是点到要害的。

《现代汉语词典》把“直言”解释为“毫不顾忌地说出来”。

所谓无顾忌，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不看脸色，不看来头、势头、人头，不顾别人臧否喜恶；另一方面，也要不计自我利害得失，不怕因此吃亏倒楣。有了这两条，就可以称为直爽坦率，开诚布公，倘不是为捞个人便宜，就简直可以称作无私无畏了。所以说，直言其实是苦口良药。作为人品来说，遇事能直言，应当看作是好的品格，哪怕他直言错了，甚至掺有某些个人杂念，但能直言而出，开口见喉，不藏头露尾，不暗设机关，总比看风使舵、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好。

然而，“言直则枉者见矣”。直出直入，就难免是其是，非其非，就会把坏人坏事直通通地“言”出来。这对某些人是很不利的。所以有些人就无视直言的可贵，只以是否听着顺耳作为辨别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这就又不免应运生出些曲意逢迎的弯弯绕、马屁精、软骨头。对权势者（对无权无势者除外），眼见错了，也要颂以正确；分明事情搞糟了，偏要谎叫“就是好”；即令偶尔冒险破例讲点缺点，也决不忘“一分为二”，以显其客观、全面、厚道、公允，决非“别有用心”。人心九曲，真话就少了。殊不知，共产党历史上犯过几次大的错误，哪次不多少与直言不兴、假话盛行有关？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类荒天下之大唐的闹剧怪事，居然能够风风火火在全国范围大行其道，在一片起哄叫好声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多少难以挽回的损失！

读者诸君请不要把上述“直言失官”几例仅当作历史故事吧，它也是一面现实的镜子。明镜高悬，人们才可能为直言叫一声好！

1988年5月5日